纪晓岚与陆青来

——兼谈十八世纪经世思潮

周积明

一、

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二岁的纪晓岚随父亲纪容舒入居京师。三年后，在户部任职的纪容舒“不复能自训课，遂遣昀受业于东山董先生”①

东山董先生即字孚存,号东山的董邦达。由于他卒谥文恪，时人又称他董文恪公。董邦达虽然在乾隆朝官至工部尚书，但他的名气主要是在绘画上。《清史稿·董邦达传》说：“邦达工山水，苍逸古厚，论者谓三董相承，为画家正轨”。所谓“三董”，即董源、董其为、董邦达。由此可见董邦达在清代画坛上的地位。

与纪晓岚受业于董邦达相同时，一批官宦子第亦读书于董邦达家。“课诵之遐”，纪晓岚与他的少年朋友们“杂坐斯与堂东厢，以文艺相质正。诸君各意气飞扬，不可一世”②。

然而，就在纪晓岚等人“谈笑锋起”之时，有一位姓陆名耀号青来的少年“独落落穆穆．不甚与人较短长”，“危坐微笑而已”。纪晓岚平生善谐,好嘲弄人，自然不轻饶性格沉静的陆耀“往往戏侮青来”。对于晓岚的恶作剧，“青来不以为忤”。他私下对当时亦学画于董邦达的季灏说：“晓岚易喜易怒，其浅处在此，其真处亦在此也”。纪晓岚听到陆青来的这番话，如醍醐灌顶，油然而生知已之感，“故与青来尤相善”。

纪晓岚与陆青来从业于董邦达数年后，相继走上仕途。纪晓岚于乾隆十二年(1747 年)举顺天乡试，名列第一。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嗣后虽官运小有波折，但就总趋势而言，可谓青云直上，飞煌腾达③，直至拜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兼国子监事，官位达到一品。陆耀于乾隆十七年中举，乾隆十九年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历户部郎中，官至湖南巡抚。

踏入官场后的纪晓岚与陆青来，联系由密而疏。然而，早年的友谊，已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亲切的回忆。《纪文达公遗集》中有一篇纪晓岚晚年作的文学，题目叫《书陆青来中丞家书后》，文中追溯他与青来初识与交谊的往事，并感叹地说：

今青来久逝，余亦衰颓，回忆当年，宛如隔世……人往风微，老成凋谢，徘徊四顾，远想慨然……。一片深情“隐隐具在笔楮间”。

假如本文仅仅落笔于纪晓岚与陆青来的友谊，那么，这篇文章可以说已经做完。由于纪晓岚与陆青来的友谊平平淡淡，没有什么令人心魄俱动、血脉贲张的故事可以大书特书，这样一篇文章可以说是无谓笔墨。然而，研究十八世纪中国文化的思潮，不能不以一种关联的目光去观看纪晓岚与陆青来，他们在各不相涉的情况下创制出具有深刻文化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与《切问斋文钞》，从而富有典型意义地指示了那一时期时代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

尽管清人李慈铭对于将《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尽归功于文达”，大为愤愤不平，然而，纪晓岚的四库馆同僚以及近现代大多学人都不约而同承认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上“一手删定”、集成定稿的特定功绩。由于这一问题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且笔者所著《纪昀评传》④又有专节论证，故不再赘言。

自《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问世，学人多将其作为目录书看待，其实，与其说《四库全书总目》是一部大型目录书，毋宁说它是一部气度恢宏的文化史著作。在这部文化史著作中，纪晓岚和他的同僚回溯“虞夏”以来的学术文化流变，并展开大规模的价值评判，从而重笔浓墨地体现了他们的价值理念。

研读《总目》，最为强烈的印象当是它以经世实学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条分缕析，这样一种价值取向至少表现在如下二大方面：

(一)立足于儒学务实传统，抨击理学心性空谈。

《总目》价值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乃是立足于儒学务实传统，全面进击由子思、孟轲至宋明程朱陆王的心性派经世路线。

心性派经世路线的要害在于以泛道德主义包笼一切，将道德、事功相割裂。《总目》针锋相对，以儒学传统相对抗：

夫儒者之学，明体达用，道德事业，本无二源，歧而两之，殊为偏见⑤。以如此理论为依据，《总目》着意将热衷心性空谈的性理之学与”孔孟之正传”划分开来：

三代以上，无鄙弃一切，空谈理气之学问⑥。

濂洛未出以前，其学在于修己治人，无所谓理气心性之微妙也⑦。 其中的一段议论来得更为直截明了：

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术实用。道学则务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

原始儒学既然以“务切于人事”为学术要旨，心性派“尊性命”的经世路线自然而然被置于“非正宗”的审判席上。

纪昀不仅在《总目》中用相当气力去揭示心性派“内圣”型经世路线对儒学传统的悖背，而且在颇多提要中指出：宋明“低头拱手、高谈性命之学者”，“空谈而鲜用”、“迂而寡当”。他们“以传道为重，但能注《太极图》解《近思录》，即为有功于世道”。“一切国计民生，皆视为末务”。其结局则无逃于“务彼虚名，受其实祸”⑨的命运：“南宋积削之后，士大夫犹依经托传，务持浮议以自文”，“议论多而事功少”，以致“国势日颓”；“明人之弊，直以议论亡国”。为了突出“清谈误国”这一主题，纪昀在编录南宋文集时，将宗泽与杨时的文集排于首次，并在《宗忠简集》提要中申明其意图：“冠以宗泽，著其说不用而偏安之局遂成。次之以时，著其说一行而讲学之风遂炽。观于二集以考虑当年之时势，可以见世变之大凡矣。”⑩

简单地指斥宋明心性之学空疏是一种浅陋之见，宋明理学家所建立的伦理学主体性的本体论，“空前地树立了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李泽厚语)自有其特定的文化价值。然而，现实的利害总胜过纯粹理论的考虑，宋明理学“尊崇性命、菲薄事功”路线所造成的历史性损伤，理所当然地激起晚明实学派与清初“经世政用”思想家的强烈抗议。《总目》弘扬儒

学务实传统，抨击理学末流性理空谈流弊，就其文化析源而言，乃是对晚明以来实学思潮的承继。

（二）以实心励实行，弘扬“以实学求实用”的著作。

《总目》是一部以目录书为特定形态的学术批评著作，它的价值理念主要通过对书籍的评价、介绍体现出来。而《总目》对乾隆以前万余种典籍的价值评估，有一个鲜明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实心励实行”，对于“以实学求实用”的学术著作加以大力推扬。

纵观《总目》所彰扬的实学著作，大致有如下三大类：

一曰“意切时用”的实学著作。如唐人杜佑所撰的《通典》“不录空言”，专事“探讨礼法刑政”，其意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总目》评价此书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⑪。再如唐人陆贽，以勇于指陈弊政著称，“其论谏数十万篇，讥陈时病”。《总目》评介陆贽的《翰宛集》时便指出：“（贽）经世有用之言，悉具是书”。“其文虽多出于一时匡救规劝之语，而于古今来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⑫。

二曰有裨于国计民生的实学著作。如明人周起元奏疏“尚多有关国计民生”，《总目》因此称许《周忠愍奏疏》一书“足垂不朽”。再如《农政全书》一书，有人批评内容过详过碎，《总目》辩说道：“农圃之事，本为琐屑，不必遂厌其详，而所资在于实用，亦不必以考核典故为优劣”⑬。对于医学著作的评价，《总目》也一从“利民生”、“切实用”出发。如《银海精微》一书，“旧本题孙思邈撰”，实际上系宋以后所出书。《总目》认为，此书“辩析诸证，颇为明晰，其法补泻兼施，寒温互用”，大有实用价值。因此，“无庸核其书之必真”。宋人李迥所作《集验背疽方》，不仅“凡诊候之虚实，治疗之节度，无不斟酌轻重，辩析毫芒，使读者了如指掌”，而且用药简易：“忍冬丸与治乳痛发背神方，皆只金银花一味”。《总目》对此兴趣盎然，以为“于穷乡僻壤难以觅医或贫家无力服药者，尤为有益”。由于《集验背疽方》一书早已散失四库馆臣特从《永乐大典》中将它采掇裒订，为今人所注目的麦饭石便是《集验背疽方》中的“最神妙者”⑭。

三曰“切实有据”的“阅历之言”。如曾为江南巡抚的明人张国维，以自己擘画水利的经验为依据，撰成《吴中水利书》。《总目》强调指出：“是书所纪，皆阅历之言”，故“指陈详切，颇为有用”，“与儒者纸上空谈，固迥不侔矣”。再如，清人陈仪曾充霸州等处营田观察使，撰成《直隶河渠志》，《总目》颇为看重此书所具有的实证性：“仪本土人，又身预水利诸事，于一切水性地形知之较悉”，因此，书中“敷陈利病之议……足以资参考”⑮。对理论经验性的高度重视，是实学思潮的一大特征，《总目》以此作为详骘经世著作的重要内容，由此足见其价值取向所在。

正是基于经世实学的观念，《总目》对于晚清以来耶稣会士传播于中国的西洋学术加以热烈喝彩：

西洋之学，以测悬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⑯

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寸有所长，自宜节取，且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之具，其法至便，而其用至溥⑰。

总之，《总目》关于学术著作价值的评说，渗透着深切的“实学”精神，其意向在于鼓励和引导学人摒弃虚玄，空疏的学风，切切实实地以学术“周济世用”，这正是中国传统“经世实学”思想的精粹。

三

就规模与名气而言，陆青来的《切问斋文钞》自然与纪晓岚“一手删定”的《四库全书总目》不是一个等级，但在晚明—近代的经世思潮中却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切问斋文钞》系陆青来辑清初至乾隆间“名宿诸作”而成。该书三十卷，分为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十二类。

陆青来是一位“读书一归于实用”的学者，他主张：“一字之奇不足侈也，千言之富未为厚也，君子盛德在躬行”。以此为信条，陆青来不仅在仕途上多有政绩，而且十分注意有关实政的学术研究。他一度主持治理运河，“于运河博稽评验，洞悉厚委机宜”，遂成《运河备考》6卷，“秉臬慎重，民命多所矜恤”。又“悯地方荒旱，著《甘薯录》”⑱。《切问斋文钞》更是他潜心经世实学的重要作品。

陆青来编撰《切问斋文钞》，“崇实黜虚”的目的性十分明确。他在致戴东原的一封信中申述自己的宗旨说：

夫理悬于虚，事征于实，虚者易冒，实者难欺。……其言之切于今者，莫如顾昆山（炎武）“行已有耻”，“田赋山利”之一学，蚀人最深。二语为废疾膏肓之药石，沈迷大寐之晨钟，而不贵言性命，存天理，遏人欲之虚谈，庶几于风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与民同。……近日从事《文钞》，大指如此⑲。

陆青来大力反对的“空虚之习”，至少包括如下三方面：

一曰空疏繁琐的考据。青来认为，对儒家经典的诠释，“既有汉之笺、唐之义疏、宋之章句，微言大义已无可憾”。然而，清代考据之士“复抉奢细琐，抉剔幽隐，人各一编，家著一集”。此种学向实乃“玩其枝叶，忘其本文，纷如聚讼，无益毫毛”⑳。

二曰理学家的性理空谈。青来对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风甚为不满。他谴责说：当世理学之士“闭户而谈无道，高座而谈明心，学案语录之书，日出而不穷，异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此又何为者也？”㉑在他看来，理学大师“彪炳史册”的不是性理之谈而是在国计民生实务上所作出的成绩，如“朱子之行社仓，复水利，蠲税银。象山之孝友于家，惠爱于民。阳明之经济事功”。承继这笔精神遗产者方可称得上“理学真儒”㉒。

三曰专务时文之卑陋士风。作为“科举之学”的时文，早在晚明便因其卑陋空疏而引起实学家们的尖锐批评。青来亦激烈指斥沈溺于时文的士子“驰鹜词章，揣摩应举，因循卑陋，又不待言。……耗费精神，为此不急道，不终晦矣乎？”㉓

而《切问斋文钞》的编撰正是企图“力破空虚之习”将士人的意趣转移到“风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等实际问题上来。

《切问斋文钞》系采辑清初到乾隆间“名宿诸作”而成。然而，陆青来选文亦非仅仅看重“名宿”二字，而是以“有裨于实用”为根本性原则。他在《切问斋文钞·凡例》中阐明选文三标准，这就是“明治道，存同异，贵有用”。“瑰词丽句，纵极工巧，概以无用不录”。为了丰富“实学”思想库，青来甚至不惜突破政治上的某些忌讳，例如，晚明张杨国、陆桴亭诸人，入清后“高蹈邱园，不求仕禄”，拒绝与新朝合作。对于这样一批前代遗民，陆青来本应采取规避态度，以免罹祸，“然其手著之文，皆切于当今政治”，陆青来仍将他们的文字收入《文钞》内，并批评“前代遗民，不宜登载”之说，“未免畛域之分”。“他如孙苏门、张蒿庵，李中孚，俱有切于

世道之言，兹偏收录甚多，亦微寓发潜阐幽之意"㉔。

将本朝名公大家的经世文章收入一书，作为经世派经世思想的载体以及播扬经世思想的器具，其滥觞可追溯到晚明的《明经世文编》。《明经世文编》的编撰者为复社陈子龙与他的同道徐孚远、宋征壁。他们有感于晚明危如悬卵的统治危机，更愤慨于其时"士无实学"的恶劣风气遂以明治乱、存异同、详军事、重经济为方针，网罗本朝名卿钜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为《明经世文编》，从而发凡创例，确立"经世文编"体。陆青来蒐集清初各家（兼及前明遗老）关于时政得失、礼俗盛衰、民生疾苦等方面的著述，分类编排，成《切问斋文钞》，明显地表现出对《明纪世文编》的继承㉕。正因为如此，河南布政使杨国桢于同治八年据金陵钱氏藏本重刊《切问斋文钞》时，将其命名为《皇朝纪世文钞》。

从《切问斋文钞》中感悟到"实学"意味的当然不止杨国桢一人。与陆青来同时的学者程晋芳盛赞陆氏"经济之文""置之宗忠简（泽），于忠肃（谦）、王文成（阳明）集中弗愧于略也"㉖。校阅《切问斋文钞》的张玉树称"集中诸作论议持平，不苟为同异，而于人心风俗、民生利病之所关，亹亹乎有味"㉗。同治七年（1868 年），李祖陶刊行《国朝文钞续编》，在有关《切问斋文钞》的介绍中，李祖陶高度评价陆青来说：

其学以六经为质的，以诸史为证据，以练达时务为门庭，以措诸实用为指南，故其辑经世文钞也，屏除一切性命理气及考据丛碎之卮言，而专取其截然有当于实用者。

篇中力扫虚浮，独标宗旨，而又不拘不腐㉘。光绪十八年（1892 年），"早年披读"《切向斋文钞》爱不释手的江苏布政使邓华熙为《重刻切问斋集》作序，有力推许《切问斋文钞》的"实学"价值：

陆朗夫先生《切问斋文钞》辑国朝名宿诸作，皆经世之言……为经世之鸿瑶㉙。

值得注意的是，邓华熙在谈到《切问斋文钞》经世价值的同时，还指出该书的一大文化影响说：

《切问斋文钞》……实为贺耦耕《经世文编》之权舆。

而在邓华熙之前，左宗棠亦曾在一份奏稿中有相似说法：

贺长龄取仕学论议阅历有验之言，仿陆曜《切问斋文钞》例，集录在书，断自本朝，都为一部，名曰经世文编㉚。

所谓"贺耦耕《经世文编》"即道光年间由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与晚清经世之学巨匠魏源主持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该书集清初至道光以前经世致用文章之大成，鲜明揭示道咸经世派注重实用、功效、变革与进取的治世精神，"不啻晚清经世运动之宣言"㉛。

左宗棠、邓华熙指出《切问斋文钞》与《皇朝经世文编》之间存在渊源关系并非空穴来风。细细观看《皇朝经世文编》的宗旨体例，不难寻觅到《切问斋文钞》乃至《明经世文编》的影响踪迹。如在选文原则上，《明经世文编》与《切问斋文钞》均"屏除一切性命理气及考据丛碎之卮言。而专取其截然有当于实用者"。在选文范围上，两书皆强调，只要裨益于时务，论相反者亦不妨兼收博采，不因人废论，这两条编辑方针均为《皇朝经世文编》所继承。在全书体例上，《皇朝经世文编》不仅依照《切问斋文钞》将经世文章分门别类加以编纂，而且将陆书平行分为十二类的分类法改造为三大部类（学术、治体、中央机构六部事务）、八门（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六十五目，从而使全书无论在宏观把握上还是细密分类上都远较《切问斋文钞》严整、成熟。

显而易见，在从《明经世文编》到《皇朝经世文编》的流程中，《切问斋文钞》是一个十分重

要的中介环节。它上承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下启魏源、贺长龄的《皇朝经世文编》，在晚明——近世的经世思潮中具有独到地位。

四

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与陆青来编纂《切问斋文钞》是两项并未发生任何干联的文化活动，然而，在"崇实黜虚"的经世意趣上，两者却表现出不谋而合的共通性，此种文化现象不能不启迪我们重新认识乾嘉时期的文化思潮。

长期以来，人们执着于这样一个观念，乾嘉年间，经世观念淹没，考据之学遮天蔽日，现在看来，这种见解有欠准确。从逻辑的进程来看，特定的价值倾向乃是从文化模式形成的过程中积淀而生，是经过人们反复感知和思考并用文化制度固定下来的集团意识，只要产生这种特定价值倾向性的文化土壤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特定的价值观念也就必然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延续性与普遍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儒家文化浓厚的经世实学传统虽然因各种历史因素的制约，在漫长的学术实践中有"淡化之时、变化之象"，但作为一种价值性的理念却始终执著地作用于中国学人的文化心理，即使在考据学风盛行的乾嘉时代，亦毫无例外。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自晚明崛起的"实学"思潮虽然在乾嘉时期大大淡化社会批判精神，但其本质性格并未发生变易。《总目》与《切问斋文钞》所倡言的便不是逃世，遁世，而是经世、用世，不是穷究性理的坐而论道与"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的繁琐考据，而是"有裨于世务"、"着意于时用"的学术研究，而这样一种价值理念在章学诚、戴震、汪中以及更多的乾嘉学者身上都可以寻觅到。

纪晓岚与陆青来思绪的不谋而通是多方面的。例如，两人都以经世学者之心，力主变通，反对泥古。两人都对宋明理学的"存理遏欲"不约而同发出抗议。观看乾嘉文化思潮，不能不注意此间的一脉相通性。

五

由纪晓岚与陆青来文化观念的不谋而合，不禁想到文化思潮的若干研究方法问题。

所谓文化思潮即某种特定的文化思想趋向。在这一思想趋向的潜在支配下，不同地域、不同部门的文化人往往表现出不期然而共通的文化意向和文化行为。因此，思潮的研究，一是要有一种穿透性眼光，而不拘泥于文化人生平事迹本身或文化产品的物质形态；二是要注重关联性，即从不相干涉的文化人或文化产品身上发现思想的共趋性。用法国学者马·法·基亚的话来说，就是要"研究唐璜式性格而不去研究唐璜本身，要在浮士德、曼弗利德、该隐这些不同面孔下发现出共同的反抗性"㉜。

一种文化观念既能推演成"思潮"，为这一思潮支配的文化人自不局限于一二著名学人，其真谛正如法国艺术史家丹纳所说："艺术家本身，连同他产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个包括艺术家在内的总体……例如莎士比亚，初看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奇迹……但在他的周围，我们发现十来个优秀的剧作家，如韦白斯感、福特、玛星球、马络、本·琼生、弗来契、菩蒙，都用同样的风格、同样的思想感性写作。他们的戏剧特征和莎士比亚的特征一样。……要了解那位大师，仍然需要把这些有才能的作家集中到他周围，因为他只是其中最高的

一根枝条"㉝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克斯也指出、在背景人物的作品中，时代思潮的显著表现"不下于在这个时代的天才们的作品中。"㉞而以往的清代文化史研究，往往清初谈顾、黄、王，乾嘉时期读戴震、章学诚。对纪昀、陆耀一类二流乃至三流的人物殊不注意。上推古代文化史研究，下推近现代文化史研究，思路亦然。如何开阔眼光，更新思维方式，拓出文化史研究乃至历史研究的新天地，看来是当代学人应再三参详的大问题。

---

①《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五，《怡轩老人传》。

②《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一、《书陆青来中丞家书后》。

③纪昀曾于乾隆三十三年因其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盐务案泄密一事获罪，革职逮问，充军乌鲁木齐，越三年召还。

④该书即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系"中国思想家丛书"之一。

⑤《总目》，卷 61，史部，《宋令懿范》条。

⑥《总目》，卷 9，经部，《先天易贯》条。

⑦《总目》，卷 92，子部，《儒家类二案》。

⑧《总目》，卷 75，史部，《两浙海防类考续编》条。

⑨参见《总目》史部，卷 61，《济美录》条；卷 89，《小学史断》条；卷 55，《钦定明臣奏议》条；经部，卷 27，《春秋王霸列同世纪编》条。

⑩《总目》，集部，卷 156，《宋忠简集》条。

⑪《总目》，史部，卷 81，《通典》条..

⑫《总目》，卷 150，集部，《翰苑集》条，

⑬《总目》，卷 102，子部，《刻本农政全书》条

⑭《总目》，卷 193，子部，《集验背疽方》条

⑮《总目》，卷 69，史部，《吴中水利》条；《直隶河渠志》条。

⑯《总目》，卷 102，子部，《泰西水法》条。

⑰《总目》，卷 115，子部，《奇器图说》条。

⑱《切问斋集》卷首，《陆公行状》。

⑲《切问斋集》，卷二，《复戴东原言理欲书》。

⑳《切问斋文钞》自序。

㉑《切问斋文钞》自序。

㉒《切问斋集》卷二《复戴东原言理欲书》。

㉓《切问斋文钞·自序》。

㉔《切问斋文钞·凡例》。

㉕《切问斋文钞》对《明经世文编》亦有重要改造。和《明经世文编》比较起来，《切问斋文钞》体例要严谨规整得多。《明经世文编》"以名位时月"为编文先后秩序，陆氏以为这样一种编纂方式"颠倒失次，不便循览"，遂依经世之学的类别分全书为学术、风俗等十二门，"于诸家同论一事中，微分次第"。在"文编"的选文上，《切问斋文钞》有三个特点：一是"立言贵乎有用"；二是尊古亦颇重今；三是歧说并存。与"仅为施政文牍之汇编"的《明经世文编》比较，《切问斋文钞》显然更具经世之学的理性自觉。

㉖程晋芳：《切问斋文钞·序》。

㉗张玉树：《切问斋文钞·序》。

㉘李钦之：《国朝文钞续编·〈切问斋文钞〉序》。

㉙邓华熙：《重刻切问斋集·序》。

㉚《左宗棠全集》，奏稿，卷 57，《请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宜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

㉛刘广京：《魏源之哲学与经世思想》，（台北）《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㉜马·法·基亚：《比较文学》，第 46 页。

㉝《艺术哲学》第 5 页。

㉞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五分册，第 438 页。

（上接第 7 页）

(13)、同注(9)中文本第八九八页后的插页。

(14)、同注(9)中文本第九九二页后的插页。

(15)、“绰尔纳河则是乌尔卡河”这一说法也是错误的。据条约条文、索额图奏报、戈洛文出使报告，绰尔纳河在尼布楚和雅克萨的中间，格尔必齐河的上方（西）流入石勒喀。而乌尔卡河的位置，在中俄双方的地图上均在阿玛扎尔河的下方（东）距雅克萨近处流入黑龙江。前人已经论证过。

(16)、同注(9)中译本第五一至五二页，俄文原版第四0至四一页。

(17)、[英]拉文斯坦：《俄国人在黑龙江》，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五七至五八页。

(18)、[日]增田忠雄：《论尼布楚条约的国境》，《史林》26－1，第五二至六八页。